

近代以来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文化的互鉴与融通

唐俊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昆明 650000

摘要: 主要基于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文化互鉴融通的基础、内容及路径的相关讨论,探究民族传统社会服饰文化与时代文化之间的互动,从而确立文化互鉴与融通对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意义。在近代以来社会形态及时代的变迁历程中,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以民族互嵌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共性基因为基础,在物质材料、款式、技艺、审美旨趣及思想内涵等5个层面互鉴融通,服饰文化在文化传播与互动中共传共享。当前,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下,云南民族服饰文化成为了当下时代创新、创意、创收的产业,及可视、可赏、可参与的公共文化,是以服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对当前社会文化状况的创造性回应。

关键词: 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服饰文化;互鉴;融通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5)01-0030-11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5.01.004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Costume Culture in Central Yunnan since Modern Times

TANG Jun

Dianchi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s, content, and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of ethnic costume culture in central Yunnan, and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ethnic social costum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so as to establish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s in social forms and times since modern times, ethnic costumes in central Yunnan are based on the humanist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thnic interweaving and the common ge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They are integrated and mutually learned in five levels: materials, styles, techniques, aesthetic interests,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The costume cultur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spontaneously spreads and shares through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and then integrates into the innovative, creative, and revenue generating costume culture industry of the current era unde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power. It is also a visible, enjoyable, and participatory public culture of the current era, and a creative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throug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stume culture.

Key words: central Yunnan; ethnic costumes; costume culture; mutual learning; integration

“艺术生产力不是一个社会的固定属性,而是不断处于变化状态^[1]。”服饰在不同语境中以不同方式被改造、完善,是各民族构建自我的直接展示,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

理解。随着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话题,学术界开始关注当代不同民族间服饰文化的交流,相关成果讨论了土族^[2]、藏族^[3]等对其他民族服饰文化元素的

收稿日期:2024-11-17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4J1147);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校级科学研究项目成果(2023XJ10)

采借,以及黔东南民族服饰交融的现象、成因及意义^[4]。云南作为一多元文化共存区域,服饰文化的互鉴融通贯穿了近代以来^①的整个历程,相关成果甚少。

以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楚雄州)为中心及其周边的云南中部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有汉、彝、白,杂居以苗、回、傈僳、哈尼、纳西、壮、傣、满、蒙古、水、布依等。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促进了服饰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形成了一体多元的特点。近年来,云南省政府着力激发民族服饰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完善的产业链和不断提升的产业效益,推动了民族服饰文化嵌入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促进了地域性传统民族服饰文化融通成为当下的文化符号。

一、近代以来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文化互鉴融通的基础

(一) 民族互嵌的人文生态环境

云南中部地区的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居住。明清改土归流后,昆明、大理等云南的主要文化城镇与内地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愈加密切。加上中华民族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包容性、渗透性及黏着性特点,各民族之间文化互动日趋频繁,不断重塑各自的文化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同质性日益增强,形成了多元与共性并存的文化格局^[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等的民族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嵌。云南中部地区族际通婚的比例越来越高。由两三个民族组成的家庭数量越来越多^[6]。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及对口帮扶举措的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地区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地方和国家之间联系也更为紧密。

(二) 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共性基因

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共性基因,根植于华夏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中。服装形制强调君臣有别、长幼有序的差序格局。作为“器”的服饰不但能“载道”,而且是民族文化“礼”和“理”的象征^[7]。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经纬交错织造布料是为秩序的一种体现。经纬之秩序亦为礼法之秩序。如孔颖达疏:“言礼之於天地,犹织之有经纬,得经纬相错乃成文,如天地得礼始成就^[8]。”

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皆以平面结构为特点,分为“上衣下裳”“上下连属”“上衣下裤”^②。中华民族穿衣伊始即“为上

衣以象天,为下裳以象地”^[9]。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以象征天的衣及象征地的裳包裹,从而构成天、地、人的完整体系,是为“天人合一”。着装是个体生命统一于自然之中的体现。作为“物”服装,与身体的“我”,通过着装过程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故而在款式结构上,以顺应面料的自然状态为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程度对整幅布料运用而形成的服装款平面式结构也就有了惜物、节用的内涵。

基于织造技术和平面刺绣形成平面性装饰图案,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又一共性。用于装饰服装的图案,因“观物取象”“象以尽意”“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影响,而形成“比德”内涵,故而有隐喻、吉祥、崇敬自然的特征。对内涵呈现的需要,促进了装饰服装的图案最大程度展开。加上服装平面性结构服装易于拼合的特点,也就形成了镶拼特征。这一特征在明清以后越发繁缛复贍。

二、近代以来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文化融通互鉴的主要层面

(一) 服饰物质材料

用于制作服装的物质材料通过流通而被各民族采用,进而促进了服饰文化的融通。近代早期,不同民族之间流通的服装物质材料以麻布、羊毛布、火草布、羊毡及动物皮毛为主。相关记载甚多,例如《宣统楚雄县志述辑》载彝族“有黑白两种……绣花、绩麻、织布,或市洋(羊)毛布、火草布为交易^[10]”。

服装材料的流通随时代而变化,促进民族服饰面料的更迭,甚至影响民族服饰的风格。近代早期,棉布渐成为了云南少数的服装面料。宝禄·维亚尔记载路南地区(今石林彝族自治县,下同,以下简称石林县,下同)越来越多的彝族采购汉族生产的棉布制作服装,麻布的生产渐少^[11]^[94]。自光绪年间就已大量生产的花边(又叫“绉子边”)美艳而精致,至今仍然是云南各民族制作服装时采购的主要装饰材料之一。20世纪80年代左右,江苏、上海、广州、浙江等地大量的服饰原材料涌入云南,面料有棉、麻、涤纶等,辅料有花边、丝线、棉线、开司米毛线、彩珠、流苏、金银线、彩带、亮片等。这些材料的流通,奠定了云南民族服饰变迁的物质基础,并以丰富的质地及艳丽的色彩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服饰华丽风格的形成^[12]。

云南中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并非被动地接纳市场上的服装材料,而是双方主动地融入于商品流通中,形成彼此不分割的整体。过去,昆明、大理等城镇,各地的农村集

① 近代史的时间是1840—1949年,本文对“近代以来”的时段界定为1840年到当下。

②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改制,“裤”遂成为下装的一种。

市、庙会,彝族的“立秋会”“三月会”“花街”,苗族的“踩花山”等节日集市,是各民族交易羊毡、麻线、土布、纱线等服装材料的场所。不断上涨的服装材料需求推动了专门市场的出现,加速了服装材料在民族之间的流动。例如,民国时期,巍山县县城就形成了妇女早市,是各民族每日交易服装材料的专门市场^{[13]3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昆明市螺蛳湾发展成为全省民族服装材料的批发市场,各地各民族的采购商纷至沓来。而今,昆明市新螺蛳湾商贸城三期服装纺织区是云南省最大的民族服装材料的销售市场。琳琅满目的民族服装材料中,所销售的各式绣片、银泡、铝片都兼顾云南民族的服饰传统,以满足不同民族的需求。

(二) 款式及部件

以借采、改良的方式吸纳周边民族的服装款式或部件,促进了云南中部地区的民族服饰逐渐形成同中有异的特点。

服装款式方面,各民族均受到中国传统款式及时装的影响,其中彝族最具代表性。20世纪初期,在汉族、满族服装的基础上,融入彝族元素的款式逐渐成为彝族服装的主流。传世实物显示清末彝族对汉族服装接纳甚广。以清末楚雄曲和府(现武定县)彝族土司夫人新娘服为例(见图1),该款式上衣为汉族大襟衣及马面裙,头饰为圆顶红帽,彝族传统三角包被融入其中,作为配件和马面裙一同搭配,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彝族百姓同样受汉族服饰影响。在19世纪末期留存的照片中^[14],昆明市石林县圭山一带的彝族妇女穿右任大襟及裤子,男性戴圆帽着右任上衣,均有典型的汉族服装款式特点。当前,昆明市禄劝县、楚雄州武定县等地的彝族纳苏支系穿右任大襟衣时不系围腰,大有清末满族服饰之遗风。随着时代的发展,采购的时装亦与民族服饰一同穿着。在20世纪60年代昆明市石林县彝族男女青年集体照片中^[15],男青年将绣花麻布褂子与衬衣搭配。而今彝族亦有工业批量成衣与传统服饰部件搭配的情形。彝族传统羊皮褂、火草衣、贯头衣至今仍有留存。其中,火草褂已成为当下馈赠的高档礼品。

彝族、白族的服装款式对周边民族影响明显。云南中部地区的各民族妇女传统服饰以平面结构为特点。昆明、楚雄两地区的民族多为右衽斜襟长袖、长裤或裙子,搭配围腰。受彝族影响,楚雄州南华县白族,禄丰县、武定县等地的傣族女子服装与当地彝族近似。楚雄州的大花苗虽外衣仍用整片布料直接覆盖身体,但袖口明显

收紧,常内穿与当地彝族类似的立领右任大襟衣,完全不同于云南昭通地区大花苗用整幅面料拼接出宽大贯头衣的特征。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白族的女装款式为右衽领褂、右任斜襟衣、长裤。当地的傣族、纳西族、楚雄州大姚县部分地区的彝族,甚至云南西部地区诸多民族^③上衣的细节不尽相同,但款式及结构特征都与白族近似。

各民族对借鉴而来的服装款式及部件的改进,促进了多元化特点的形成。以云肩为例,这一部件在西南地区各民族服饰中发展出了诸多形式的披肩。其中,大理市附近的白族新娘佩戴一种三层的绣花披肩,最底层为缀以流苏的如意形,另外两层为花瓣形(见图2)。玉溪市通海县蒙古族的披肩以白银打制,为银链交错的环状,末端的银须恰如云肩的流苏(见图3)。楚雄彝族的披肩款式多样,其中一些披肩以绣花为底,缀以银须,兼具上述二者之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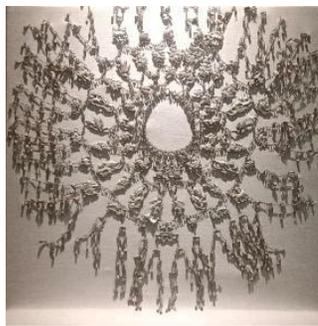
各民族对服装款式或部件的采借、改良有持续性、继承性特点。以草鞋的采借到绣花凉鞋的变化为例。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草鞋是当时云南各民族生活的必需品。据宝禄·维亚尔记载,打草鞋为路南一带彝族男性必须掌握的技能,并将草鞋销售给汉族^{[11]196}。民国时期,路南年草鞋3万余双对外销售^{[13]322}。当前,多地都有和草鞋十分近似的绣花凉鞋(见表1),显然是基于草鞋发展而来。可见,借采来的款式或部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进,遂成为了传统。当前云南中部地区汉族、白族、彝族(见图7)均有前尖翘起的绣花鞋款式(见表1),即为民族服饰部件互鉴的体现。当下楚雄地区销售的马缨花图案皮鞋(见表1)同样是这一方式的呈现。

(三) 服饰技艺

服装生产技术的引进与流动、银饰技艺的融通、刺绣技艺的互鉴是云南中部地区在服饰技艺层面的互鉴融通主要方面。

服装生产技术方面,新生产技术的引进贯穿于云南中部地区近代以来的全过程。首先,不断从外部引进的先进纺织技术促进了新型服饰原材料的流通。棉纺技术流传到云南后并不断改进。以巍山县为例,民国时该县引进了新式织布机及“提花布”工艺,促进了面料的创新,“大提庄”“水波云”“黄鳝骨”“竹节花”等新样式的面料流通到云县、缅宁(今临沧市)、景东、思茅等地^{[13]32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云南纺织厂为首的纺织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带领各民族劳动群体参与到纺织行业中,

③ 迪庆藏族自治州及保山市的傣族、丽江市的纳西族、怒江傣族自治州的怒族及普米族等。

图1 20世纪初期武定环州
彝族土司夫人新娘服^①图2 20世纪70年代大理市
喜洲镇白族披肩^②图3 20世纪70年代玉溪市
通海县蒙古族披肩^③图4 当下昆明市石林县彝族鲁底
鲁咪品牌生产的机绣绣片

生产的优质纺织品销往各地。其次,不断从外部引进的新制衣技术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传统服饰生产方式、款式及结构的改进。以昆明市石林县为例,该地区20世纪20年代就已引进时装生产技术^{[13]324}。而今,该县鲁底鲁咪等民族服饰品牌,不仅生产传统平面结构服装款式,还借鉴西式结构技术生产改良的彝族传统服饰款式,并引进电脑绣花技术生产当地彝族绣片(见图4),以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方式满足当地最广大群众对民族服饰的需求。再次,新生产技术的引进促进了新装饰形式的形成及改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普及的脚踏式缝纫机,促进了线迹交错的缝纫机绣种类的形成(见图5)。此外,传统民族服装材料生产技艺的流动促进了技艺的跨民族传承。这方面火草纺织与擗毡技艺最具代表性。云南的彝^④、傣^⑤、纳西^⑥、傣^⑦、壮^⑧、苗^⑨、普米^⑩等民族均掌握火草技艺,分布地区遍及云南中部、西北及东南,不仅分布地区广,并且掌握该技艺的民族数量众多。这显然是服饰生产技艺在民族之间流动的结果。从擗毡技艺的流动,可以管窥不同民族之间服饰生产技艺可能的流动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理喜洲金圭寺村的白族以擗毡为业,所制擗毡精美,除了对外销售,还常到彝族地区上门加工,久而久之宾主情谊深厚,遂将擗毡技术传授与彝族^[16]。

银饰技艺方面,依赖于工艺技术而生产的银饰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融通。白族将源自汉民族的银制品工艺^[17]发展为其代表性手工艺。一方面白族银匠同时生产销售不同民族的银饰,推动着不同民族之间银饰文化的交融。例如民国时期,仅巍山县白族就生产耳环、



图5 当下昆明市石林县彝族缝制机绣背被带

手镯、手匝、胸花、项圈、百家锁等50余个品种,大量销往大理、弥渡、云龙、临沧、保山、梁河等地^{[13]326}。传世银饰中,云南中部地区的汉、彝、白、蒙古等民族常用芝麻铃点缀银饰物,女性胸前的银链常有针线筒、挖耳、牙签、锥子等实用物品,儿童银饰中百家锁、佛俑也十分常见,原因也就在此。另一方面,外出谋生的白族银匠返乡,促进着民族银饰的互鉴。百余年来,鹤庆新华村大量的白族银匠进入西南彝、苗、藏等民族的村寨,与各民族互惠往来;随着云南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大量银匠返乡的同时,带回了其他民族的篆刻技艺、纹样、审美趣味,进而融合创新,白族银制品从西南走向了全国,走到了海外^[18]。不仅如此,融合创新后的白族银饰加工技更加精湛,吸引了藏、汉等民族的匠人上门拜师学艺,甚至国内外著名首饰设计师都前来交流,银饰技艺的互鉴更深刻。

装饰工艺方面,各民族不断地交流促进了服装装饰工艺形成了同中有异特点。同的一面是:各民族普遍掌握刺绣、挑花、拼布技艺,并且存在不同民族在相同的部位以相同的工艺装饰同一类图案的情形。例如,大理市喜洲镇的白族、昆明市石林县的彝族、昆明市的汉族等都用拼布技艺制作铜钱纹背被。异的一面,主要来自于相同

④ 楚雄州楚雄市、南华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县、牟定县,昆明市石林县、寻甸县、东川区,曲靖市马龙县,大理州鹤庆县,丽江市永胜县。

⑤ 大理州祥云县、漾濞县、宾川县,丽江市永胜县,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⑥ 丽江市永胜县、玉龙县。⑦ 楚雄州大姚县、永仁县。⑧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⑨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

⑩ 丽江市永胜县。⑪ 楚雄州博物馆图片。⑫ 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品。⑬ 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品。

表1 云南中部地区部分民族代表性绣花鞋款式

款式类别	地区	民族	具体代表性地区	年代	图例
绣花凉鞋	昆明	汉	晋宁区宝峰街道	20世纪90年代	
	昆明	彝	官渡区阿拉乡	20世纪90年代	
	楚雄	彝	南华县	20世纪90年代末期	
绣花布鞋	昆明	彝	西山区团结镇	20世纪90年代	
	昆明	彝	石林县	20世纪20至40年代	
	昆明	白	西山区团结镇	20世纪80年代	
	楚雄	彝	永仁县	20世纪80年代	
绣花皮鞋	楚雄	彝	咪依噜彝族服饰品牌门店	当下	

的服装装饰工艺因搭配的图案不同、受周边民族影响不同,而产生丰富的变化。例如刺绣,相同的技艺因在不同民族中运用的部位及所搭配的纹样不同而趋异。如表2所示,楚雄州武定县的彝族主要以刺绣绣制马缨花、山茶花、钩镰纹、菊花。大理市喜洲镇白族则主要将刺绣用于对牡丹花、蝴蝶、人物的绣制。玉溪市澄江市汉族同样以刺绣绣制牡丹花,但图案与白族大为不同。再如贴布绣。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彝族以明度变化的彩色布料拼接装饰背被。昆明市晋宁区汉族的贴布绣结合钉线绣针法^⑭绣制,并以多层布料堆叠贴制的牡丹花背被为特色(见图6),其以金线压边的方式与壮族并无二致。昆明市石林县彝族背被(见图7)借鉴了南部壮族贴布绣的形式,以同心圆结合角隅纹样编排,但以当地图案结合刺绣绣制,不用金线。楚雄州南华县等地的彝族常以刺绣图案与贴布绣组合,绣制围涎、背被等部件,虽工艺相同,但风格迥异。其中,大姚县彝族以细碎的贴布绣装饰服装(见图8),甚是特别。

(四) 服饰审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中部地区的民族服饰风格整体逐渐变得繁缛华美,并吸纳了中国传统服饰吉祥、象征的审美旨趣。各地区越来越多妇女在劳作之余生产零碎绣片,结合花边、彩带、布条等环绕衣领、肩周、袖口、裙边、脚口、围腰及挎包边缘装饰,形成有镶滚特点的繁复华丽服装。其中,楚雄州永仁县(见图9)、武定县的一些彝族妇女服饰甚至“满身镶滚,不见底布”。然而,这些繁复装饰的民族服饰中,不少上衣前片却远远比后片短,要与同样繁复的围腰搭配后,前后长度才相当。诸多民族以各种零碎布料结合刺绣、镶拼工艺制作出繁复华丽的围涎、背被、服装。其中,楚雄州大姚县桂花镇的“老虎衣”(见图10)显示了基于有限材料最大限度装饰服装的智慧。在节用的实用价值与繁缛的审美价值之间,显示出二律背反特质,正是中国服饰美学的特点之一。

“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审美旨趣因以祥瑞之意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民族服饰中彰显出

^⑭ 为以一根绣线环绕另一线固定的针法,针法原理与盘金绣近似,主要用于图案轮廓边缘的固定及装饰。该针法名称在各地的有差异,亦存在被固定的材料不同、或固定时线迹的紧密程度不同而针法名称不同的情形。

旺盛的生命力,可举的例子甚多,但均不是简单的挪用,而是加以改造,或有机地融合。以对汉字的运用为例,“卍”“喜”“福”“寿”等汉字被少数民族用于服饰不同部位的装饰(见表3)。图11中大理市的白族将“喜”“福”字样

与八角花、蝴蝶等图案及其他文字组合,为对年轻美好的祝愿。楚雄州彝族服饰中的“喜”“寿”字纹常用挑花、拼布工艺装饰,其浓烈的色彩与其他刺绣图案浑然一体。对儿童祝福的愿望,激发了彝族妇女的创造性,在围涎及

表2 云南彝、白、汉代表性地区的主要服饰纹样及装饰工艺

民族	代表性地区	服饰部件名称	主要纹样	主要装饰工艺
彝族	楚雄州牟定县猫街镇	女子上衣	马缨花、山茶花、菊花、四瓣花、钩镰纹、齿轮纹、盘长纹	刺绣
			蕨叶纹、菱形纹、雪花纹	挑花
		女子围腰及背披	马缨花、菊花、钩镰纹	刺绣
			缨络纹、菱形纹、蕨叶纹、八角花、犬齿纹、回纹、雪花纹	挑花
		女子裤子	马缨花	刺绣
			菱形纹、人形纹、蝴蝶、回纹	挑花
背披	盘长纹	贴布		
	马缨花	刺绣		
白族	大理市喜洲镇	女子头饰	牡丹花	刺绣
			十字纹、八角花	挑花
		女子上衣及领褂	六瓣花、线迹纹	扎染
			牡丹花、蝴蝶、菊花、羊角纹、梅花	刺绣
			万字纹、犬齿纹、盘长纹	贴布
			六瓣花	扎染
		女子围腰	牡丹花、蝴蝶、回纹	刺绣
		女子裤子	回纹	贴布
			菱形纹	挑花
		背被及挎包	梅花	刺绣
牡丹花、人物、蝴蝶、荷花、菊花、梅花、鸟、四瓣花	刺绣			
儿童帽子	铜钱纹	拼布		
汉族	玉溪市澄江县阳宗镇	女子上衣	牡丹花、喜鹊、山茶花、凤凰	刺绣
			四瓣花、荷花、蝴蝶、八瓣花、菱形纹、人物	挑花
			盘长纹、四瓣花	盘条、贴布
		女子围腰	牡丹花、荷花、鱼、蝴蝶、石榴、凤凰	刺绣
		女子裤子	蝴蝶纹、十字纹、菱形纹、蕨叶纹、八角花、缨络纹、羊角纹	挑花
		儿童帽子	牡丹花、菊花、荷花、石榴花、桃子	刺绣
		鞋子	牡丹花、荷花、石榴花、钩镰纹、蝴蝶、蜜蜂	刺绣
十字纹	挑花			
		盘长纹、花瓣纹	贴布	



图6 20世纪90年代昆明市晋宁区宝峰街道汉族贴布绣背被局部(上端)



图7 20世纪80年代昆明市石林县彝族贴布绣背被



图8 21世纪初期楚雄州大姚县彝族贴布绣服装绣片

围裙上挑绣“金玉满堂”“长命百岁”之类文字的百家锁纹样(见图12),是对儿童银锁模仿的结果。

各民族服饰传统刺绣图案不追求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再现,以概括形象为尚。例如,大理州白族,楚雄州大姚县、禄劝县及昆明市彝族,昆明市晋宁区汉族的青花素绣无论是图案类别,还是形式,均不相同,但皆以图案简洁、平面填充为特点,并都有青花瓷清爽、秀美之意蕴。同一地区的民族审美趣味因对图案借采而变得近似。例如,昆明市呈贡区、晋宁区(见图13)、玉溪市澄江市阳宗镇一带的汉族刺绣原以秀美为特点,在与周边彝族长期接触中,遂亦吸纳了彝族浓烈、艳丽(见图14)的审美趣味。昆明市呈贡区马金铺街道的汉族围腰除了有纤细秀美的花鸟刺绣图案外,还有借鉴了西山区团结镇彝族红、绿、粉三色配色的挑花图案围腰。受彝族影响,玉溪市澄江市阳宗镇汉族的刺绣由富丽(见图15)变得浓烈(见图16)。同时,西山区彝族亦借鉴了汉族刺绣秀美的图案及配色(见图17)。值得指出的是,借采而来的图案在不同民族中的用法不同,服饰的审美趣味亦差异明显。以挑绣的八角花为例。昆明市石林县彝族以巨大的八角花绣制背被,有强烈的发散节奏感。大理州白族以中等大小八角花挑绣的手绢则更显素雅。楚雄州彝对八角花的用法丰富,或精致细腻,或浓艳而华丽。可见,各民族在借



图9 20世纪80年代楚雄州永仁县彝族服饰^⑤



图10 20世纪90年代楚雄大姚县彝族服饰



图11 20世纪80年代大理市白族手绢



图12 20世纪80年代双柏县彝族儿童围涎

表3 云南中部地区部分民族服饰汉字运用统计

民族	地区	主要文字	主要运用部位	主要装饰工艺
彝族	昆明	卍	儿童围涎,男子腰包	挑花
		囍	女子上衣	挑花
		福	女子背披	挑花
		其他文字	儿童围腰	挑花
	楚雄	卍	女子上衣肩托、袖口、头巾、背披、底摆、围腰,男子肚兜	拼布、挑花、刺绣
		囍	女子裤脚、袖子、围腰,鞋垫	刺绣、挑花
		寿	女子上衣肩托、袖子、衣襟、围腰、背披、裤脚,男子肚兜	刺绣为主,兼有挑花
		其他文字	女子背披,儿童围涎	挑花、刺绣
	大理	卍	女子上衣肩托、袖口、头巾	拼布、挑花
		囍	挎包	挑花
寿		挎包	挑花	
福		挎包、手镯	挑花、锻造	
白族	大理	卍	女子上衣袖口	刺绣
		囍	女子手绢、头帕	挑花
		寿	女子围腰	刺绣
		福	手绢	挑花
		其他文字	女子手绢	挑花
傣族	楚雄	囍	女子围腰、鞋子	刺绣、挑花

^⑤ 楚雄永仁县直直村彝族服饰,李昆声,周文林《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鉴、吸纳、融合周边民族审美趣味的过程,亦是丰富各民族服饰美的形式及趣味的过程。

(五) 服饰文化内涵

儒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注重仁义,深刻体现了秩序、等级与礼仪,“着‘衣’者亦即人的社会身份或着装者的精神主体”^[19];服装也即具象化了的政治伦理意识、礼仪规范及道德伦理。云南中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虽未全盘接受这些观念,但大多都以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着不同服饰呈现长幼有序的规范,并以服饰呈现社会伦理道德。例如,白族因受汉儒家思想影响而在服饰上凸显“比德”内涵。白族认为“要得俏,一身孝”,对伦理意识及孝道文化的崇尚促使白族将其外化为以白色为美的观念。白族手绢采用青、白两种颜色,寓意着“‘一清二白’做人”。在一些地区则两色一同佩戴,是为“清清白白”之品德。其寓意及其用意与明清时期以青色莲花喻“清廉”的品德如出一辙。又如,楚雄州永仁县直苴村赛装节传递了彝族的审美观念:“绣花绣得最好的姑娘是最美的”。这一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新社会规范及秩序建立的开端。即:进入农耕社会后,彝族内部对女性社会分工的重新定义——女性需要具备良好的织绣技能,否则难以满足婚后家庭对服装的需求。复如,纳西族的七星披肩一方面是对妇女披星戴月劳作的赞美,但另一方面,七星披肩同时也是规训女性的标准。再如,石林彝族以包头上“蝴蝶”的位置区分妇女生育与否^⑩,既是对女性身份的标识,也是此两种身份女性道德规范的外化——在石林撒尼传统文化中,未婚男女可以在好友的陪伴下与意中人在村里有男女卧房的公房小住,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决定是否正式交往,已婚女子则不具备这样的权利。

相同时代背景及社会形态促进了邻近地区民族服饰文化内涵的互鉴。例如,石林彝族以阿诗玛服装象征爱情的忠贞,大理州白族以蝴蝶图案象征爱情之纯洁,楚雄州彝族以马缨花纪念舍己为人的女英雄^⑪,皆以不畏权贵、奋力抗争的思想为内核。可见,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的互鉴以深层次的服饰文化内涵交流为底色,是不同民族之间服饰文化内涵融通的体现。

不得不提的是,云南各地少数民族传统图案均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一些影响了汉族及其他民族。例如,彝族以

钩镰纹象征勤劳,楚雄州的傈僳族、昆明市部分地区的汉族亦在服饰中绣制该纹样。

三、近代以来云南中部地区服饰文化互鉴融通的路径

“任何时期的‘传统’,本质上都是一种重新发现的‘现代’”^[20]。在民族服饰文化中,这种发现通过互鉴融通,以共享、共传、共创、共建的方式生动地呈现。

(一) 文化传播与互动促进服饰文化在民间共传共享

在云南中部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过程中,服饰文化呈现自发性互鉴融通的特点。过去因效仿之风盛行的服饰,历经改造逐渐成为了当前该地区代表性民族服饰。封建社会中因统治阶级占据较多的审美需求对象而导致服饰审美时尚以“上行下效”的方式传播^[21]。清代末年白族上层社会阶层对汉文化的推崇,以及楚雄地区的土司对汉族服饰的改良带动了民族内部对汉族服饰款式的接纳。

当前,通过商业活动构建起来民族服饰贸易网络让互动愈加频繁,互鉴愈加明显。在多民族杂居地区,一些民族服饰的经营者往往同时设计并生产当地不同民族的服饰。例如,彝族刺绣市级传承人尹配兰经营的“澎湃民族服饰”店铺除销售彝族服饰外,还有当地汉族、苗族、傣族、傈僳族的服饰^{[22]⑫}。这样的经营方式必然会促进同一地区不同民族服饰同质性元素增加,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当地不同民族之间的互鉴。

如果说商业贸易促进了服装材料及服装款式的交流,那么区域性的服饰刺绣互鉴则除了受到商业利润驱使外,还受到杰出服饰手艺人创作的影响。用于服饰刺绣的图案主要以剪纸和手绘^⑬两种方式创作。其中,剪纸艺人所售卖的花样推动着服饰图案在附近的村落和民族之间流动。手绘艺人则根据乡邻的需求绘制刺绣图案,进而促进当地民族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例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楚雄州双柏县大麦地镇服饰手艺人方兰英,所绘图案精巧灵动,附近村子里的服饰刺绣图案大多都出自她,周边妇女甚至模仿其风格,最终促成了双柏县东南乡镇民族服饰刺绣风格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由古典(见图18)向灵巧(见图19~20)转变。摆摊剪纸的方式在一些地区已转变为门店经营,民族服饰的文化互惠交流更直观地显现了出来。

随着时代的变化,新型交流方式服饰文化在民间产

⑩ 在石林彝族圭山型服饰中,未生育的女子包头为左右各装饰一个三角形绣片,谓之“蝴蝶”;已生育女子的包头则在顶部平放一个“蝴蝶”。而石林型服饰中,未生育的女子包头上的流苏及“蝴蝶”垂至肩部,已生育女子则在包头的侧边装饰一个“蝴蝶”。

⑪ 关于彝族马缨花另有胎血所化之说。两种传说,一为对生育的崇敬,一为英雄形象的构建,皆为社会形态影响下民族心理的映射。

⑫ 昆明市禄劝县至今依然保留有以竹签蘸泥浆绘制刺绣图案的传统,而今多见以高光笔、热消笔、铅笔等工具绘制。

生,跨民族交流愈加频繁、密切,共享服饰文化资源、共同传承的局面业已形成。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越来越多地区构建起民族服饰及刺绣网络交流社区,不仅买卖手绘的刺绣图案,甚至交流技艺。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服饰文化跨民族传承已经实质性显现。云南诸多地区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非本民族的代表性传承人。例如,昆明市禄劝县,截至2022年,该县12名代表性彝族刺绣传承人中,9名为汉族,3名为彝族^{[22]76}。共同传承的服饰技艺成为了当下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基础。以楚雄州彝绣龙头企业南华七彩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例,创始人丁兰英出生于彝汉融合家庭,并以汉族身份成为了彝族服饰的第四代传承人。其公司不仅有彝族服饰手艺人,更有掌握彝绣技艺的白族、苗族、汉族、哈尼族、回族、傣族的杰出艺人,一同把共享共传的技艺作为共同发展的事业建设。

(二) 当下国家在场推动传统民族服饰文化创造性转化

在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文化的再生产是基于原有文化的重构,通过对文化符号不断地再生产而弥散到所有的社会空间^[23]。当下我国以行政力量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云南着力挖掘楚雄州永仁县直苴村的赛装节的文化价值,从赛装的形式、赛技的本质、赛

美的内涵出发,将其打造为当代的“丝路云裳·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以下简称民族赛装文化节),并通过产业化发展将其转化为适应当下时代的文化符号,从而创造经济价值。

2016年民族赛装文化节在直苴村正式启动。2017与楚雄州彝族火把节结合,进一步拓展了活动的开放性。而后以系列活动的方式跨地区开展,影响力逐渐扩大。自2020年起,民族赛装文化节活动期间举办民族时装周(见图21),参与群体扩大至省内各地区代表性民族服饰品牌、省内及部分国内服装品牌、设计师群体(见图22),赛装节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深化。2023年,民族赛装文化节楚雄时装周与招商推介会一同举办,吸引了来自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泰国等7个国家,云南省内外24个州(市)、楚雄州10个县市的代表队、民族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完成39场时装秀^[24]。民族赛装文化节而今成为了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的民族时尚盛会。

将赛装节打造为当下的民族服饰文化符号的同时,楚雄州政府从统筹引领、政策、行业规范、产业化、人才储备、市场化等方面全面发力发展彝绣产业。建成彝绣车间77个、绣坊513个、彝绣规上企业13家、彝绣经营户538户,绣娘共计5.7万^[25]。并将国家对口帮扶政策当作



图13 21世纪初期昆明市晋宁区宝峰街道汉族围腰绣片 图14 当下昆明市西山团结镇彝族衣襟绣片 图15 20世纪80年代玉溪市澄江市阳宗镇汉族枕顶绣片 图16 当下玉溪市澄江市阳宗镇汉族枕顶绣片 图17 21世纪初期昆明市西山团结镇彝族围腰绣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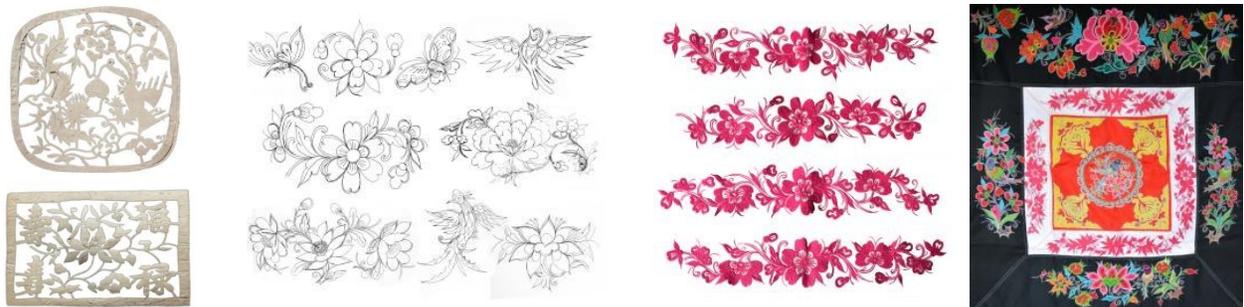


图18 20世纪初期双柏县彝族刺绣纸样 图19 21世纪初期楚雄州双柏县彝族方兰英绘的刺绣纹样 图20 21世纪初期楚雄州双柏县彝族以方兰英绘制的刺绣纹样绣制的图案及背被

发展机遇,不断深化沪滇、闽滇文化合作交流,与东方国际(集团)、莆田三福等企业合作。其中,东南大学对口帮扶南华县,累计投资700余万元建设彝绣生产园区,并从人才培养、产品开发、品牌打造方面协助建设彝绣产业。复旦大学则从文化产业的政策创新方面协助楚雄州制定政策。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云南中部地区诸多民族刺绣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相关单位协调各方,培训刺绣人才、促进彝绣企业内外交流。东方国际(集团)促进了吉承、王陶等国际知名设计师挖掘彝族服饰文化,发布彝族服饰元素时装,推动彝族服饰文化走出国门,登上纽约、米兰时装周。2024年楚雄州委宣传部与云南艺术学院、当地企业联合打造了35套彝族服饰元素时装,登上了巴黎时装周^[25]。

以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云南中部地区民族服饰文化产业化取得了跨越式发展。2023年的楚雄时装周系列活动促成了32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签约总规模164.77亿元^[26]。当前的云南彝绣产业深度融入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服装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彝绣产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0.21亿元^[27]增长到2023年的2.75亿元^[25],完成出口订单510万元。楚雄州永仁县直直村的赛装节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民族服饰文化活动,在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社会各界组织及人士协作,当地彝族企业及个人参与,群众互动的推动下,成为了当下时代的创新、创意、创收的文化产业,亦是当下时代可视、可赏、可参与的公共文化。

四、结语

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促进了各民族的服饰文化在社会和时代变革中互鉴融通,形成多样性的民族服饰文化。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下时代的存续性,决定了其具有转化为适应未来时代的能动性。近代以来,云南中部地区各民族服饰文化各层面的互鉴融通,是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创造,促进了民族服饰文化成为可供挖掘、转化的文化资源。当下云南中部地区对民族服饰文化的挖掘与转化,是国家和民族共同对文化的重塑。当地方性的文化遗产艺术成为一种既是公共参与性的文化,又是可共传、共创、共享的文化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并存、联结的中间形态也就显现了出来。

参考文献

- [1] MCGHEE R, ARUTIUNOV S, CROWLEY D J, et al. Differential Artistic Productivity in the Eskim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mments and Repl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6, 17(2): 20-203.
- [2] 周莹,许靖熙,吴济池,等. 青海土族盘绣艺术中的文化采借与认同[J]. *丝绸*, 2023, 60(11): 117-125.
- [3] 张池,石旭. 从嘉绒藏族别斯满女性服饰看藏彝走廊的民族交融[J]. 2024, *装饰*(11): 108-113.
- [4] 龙寸英,李德宽. 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以黔东南服饰文化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22, 43(5): 99-103.
- [5] 李晓斌. 历史上云南文化交流现象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02: 159.
- [6]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概况[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85-87.
- [7] 杨鹂. 背景与方法: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导论[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4): 33-38.
- [8]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579.
- [9] 钱保塘. 帝王世纪续补[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71.
- [10] 杨成彪.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 楚雄卷下[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994.
- [11] 保禄·维亚尔,阿尔弗雷德·李埃达. 保禄·云南保禄: 法国早期对云南彝族的研究[M]. 郭丽娜,丘淑鸣,郭兰芳,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



图21 2020年“丝路云裳·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云上昆明民族时装周”民族服饰发布会场地



图22 2020年“丝路云裳·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民族服装服饰设计大赛决赛现场

- [12] 唐俊. 近代以来云南彝族的服饰审美变迁特征与动因[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4(1): 1-9.
- [13] 王天玺, 张鑫昌,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 中国彝族通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 石林彝族(撒尼)刺绣[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21: 7.
- [15] 赵德光, 黄建明,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石林撒尼人[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22.
- [16] 杨宪典. 喜洲志[M]. 大理: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 1966: 177.
- [17] 杨荣. 云南民族互嵌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5: 138.
- [18] 孙九霞, 罗意林. 非遗在民族文化中的嵌入与流动: “三交”驱动和认同强化[J]. 文化遗产, 2024(1): 9-17.
- [19] 蔡子谔. 中国服饰美学史[M].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1: 33.
- [20] 张犇, 张知临. “美美与共”: 探赜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J]. 工业工程设计, 2023, 5(4): 1-6.
- [21] 王维堤. 中国服饰文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6-37.
- [22] 彭丹. 禄劝彝族刺绣的多民族共同传承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23.
- [23] 方李莉. 论“遗产资源”活化的价值与意义[J].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4(1): 99-102.
- [24] 吕瑾. 云南楚雄州成功举办首届时装周 搭建海内外服饰互学互鉴互赏平台[EB/OL]. (2024-01-08)[2024-10-26]. <https://www.yidaiyilu.gov.cn/p/0U9AO6F2.html>.
- [25] 李杭育. 中国楚雄非遗服饰时装展闪耀巴黎[EB/OL](2024-09-27)[2024-10-26]<https://yn.chinadaily.com.cn/a/202409/27/WS66f645e4a310b59111d9b901.html>.
- [26] 刘兵兵. 首届楚雄时装周签约32个项目 总金额164.77亿元[EB/OL](2024-01-06)[2024-10-26]<http://tour.jjrbnet.com/toutiao/20240107/91554.html>.
- [27] 云南省网上新闻发布厅. 丝路云裳·七彩云南2023民族赛装文化节——首届中国·楚雄时装周新闻发布会[EB/OL](2023-12-28)[2024-10-26]. https://www.yn.gov.cn/ynxwfbt/html/2023/zuixinfabu_1227/6427.html.